

日本文化理解 与日本学研究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30周年纪念论文集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编

學苑出版社

目 录

| | |
|---------------------|--------|
|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三十周年 | 徐一平(1) |
|---------------------|--------|

语言·日语教育

| | |
|---|--------------|
| 汉日对译词典的词义解释和词语搭配——以汉语的“出现”和日语的 “現(わ)れる”为中心 | 李东哲(2) |
| 《译书汇编》(1900—1903)与中日词汇交流 | 朱京伟(15) |
| 日源外来词新词构词特征 | 崔 峯(28) |
| 日语词典学研究现状及日语词典学概论编著设想 | 邵艳红(38) |
| 日语自他动词的近代研究史浅析 | 金玺昱(47) |
| <上/下>不对称现象的汉日认知对比研究 | 徐 莲(67) |
| 汉日语关系从句的序列和位置对比研究 | 盛文忠(77) |
| 言语交际中汉日礼貌表达策略的差异及原因——以道歉和拒绝言语行为为例 | 王 源(90) |
| 日语句末名词句与汉语“是”字句对比研究 | 洪 洁(98) |
| 大概语法中的词类划分——兼与学校语法对比 | 李所成(109) |
| <动作主体>テ格的语义特征分析 | 孟会君(119) |
| 概述民国初期的日语教材 | 李 文(1) |
| 当今中国日语教育的点滴思考 | 唐 磊(145) |
| 我国青年日语教师关于“教师评价”的意识现状——基于事例分析 | 朱桂荣 蒋 伟(154) |

文 学

| | |
|---|----------|
| 东亚视阈中平安朝散文体叙事文学之诞生 | 张龙妹(170) |
| 平安朝省试诗与唐代省试诗 | 李宇玲(181) |
| 上田秋成对旅行的认识及其思想成因 | 岳远坤(194) |
| “田舍汉”的发现——以国木田独步明治二十四、二十五年的归乡体验为中心 | 曲 莉(204) |

| | |
|---|----------|
| 身体、话语与权力——《青鞥》的文化解读 | 肖 霞(218) |
| 新美南吉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兼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 《去年的树》 | 林 涛(227) |
| 旅行与文学文本的生成——阿部知二的中国旅行与文学叙述 | 王 成(240) |
| 浅谈川端康成的小说与绘画 | 章 毅(253) |
| 试论日本现代滑稽文学 | 王志松(261) |
| 女人·食物·萤火虫——试论武田泰淳《上海之萤》 | 郭 伟(272) |

文化·社会·经济

| | |
|---|----------|
| “倭”国号论考 | 胡 稭(284) |
| 试论中国龙文化及在日本的传承 | 潘 蕾(296) |
| 日本密教与大理密教之关系——通过密教文物之视角进行考察 | 王益鸣(310) |
| 西湖意象的海外传播——以日本庭园中的西湖表现为中心 | 李 伟(320) |
| 创造性人生观与中日社会变动——基于对梁漱溟与稻毛祖风的考察 | 刘 畅(339) |
| 身体政治与卫生制度：日本明治社会疾病意义之考察 | 王 梅(349) |
| 结社与共同体：中国与日本村落的差异 | 李国庆(357) |
| 近代化与家庭变迁 | 宋金文(368) |
| 安倍“积极和平主义”本质析论 | 肖传国(377) |
| 中日两国非正规就业问题比较研究 | 戴秋娟(386) |
| “安倍经济学”之金融政策评析 | 瞿晓华(398) |
| 中日两国的节能环保合作——“中日节能环保综合论坛” | 丁红卫(407) |
| 在日华人商业模式研究——以日本大手集团为例 | 潘若卫(416) |
| 日本第三部门铁路经营效果影响因素分析——利用 PEST 模型分析北 近畿丹后铁道案例 | 王 猛(423) |

概述民国初期的日语教材

1. 研究背景

日语教材研究是日语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日语教材史研究是日语教材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我国日语教育研究的不断升温,围绕日语教材展开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其中大多数研究的对象为当前正在使用的大学日语专业教材、初高中日语教材以及成人日语教育教材等,对于改革开放前日语教材的研究极为少见。整理相关研究文献可知,迄今为止,除了最近几年出现的数篇针对清末日语教材的研究论文(李小兰 2003;李小兰 2004;李小兰 2006;鲜明 2010;陈娟 2012;陈娟 2013)之外,涉及民国时期日语教材的研究少之又少。马可英(2010)以“日语基础丛书”的九种教材^[1]为研究对象,详细介绍了其主要内容,并总结了该丛书的特点、流播及其对今天的启示。该文是针对民国日语教材进行研究的一个有益尝试,但民国时期出版的日语教材数量众多,一套教材尚无法反映民国时期日语教材的整体状况。

清末以来,我国的日语教材编写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一百多年间,虽然我国的日语教育及日语教材编写在不同历史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发展道路并不平坦,但是至今已经编写出版了数量巨大的日语教材。不同历史时期都出现了哪些日语教材,这些日语教材在内容选择及呈现方式上体现出了哪些特征,我国日语教材编写历史中蕴含着怎样的规律,这些规律对我国现在及将来的日语教材编写又有哪些借鉴意义,这都是之前的研究涉及较少的课题。人民教育出版社主持实施了2010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095),作为其子课题“百年中小学外语教科书的变迁研究”的组成部分之一,人教社日语编辑室对清末以来我国日语教材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对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日语教材进行了分析。其中,对于民国时期日语教材的收集、梳理、分析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作为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将主要介绍民国初期^[2]日语教材出版的概况,总结该时期日语教材的总体特点,并详细介绍国内出版的代表性日语教材,努力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勾勒出该时期日语教材的整体形象,以期为我国日语教材史的补足尽绵薄之力。

2. 民国初期的日语教材概况

近代以来,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改革,跻身于资本主义强国之列,而中国逐步沦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两国局势的转变促使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

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中日通商章程》，从此两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两国政府层面的交流不断增加，在实际的交流过程中，清朝政府认识到了培养日语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1894年甲午战争过程中，清朝政府认识到了培养日语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基于上述中清王朝的惨败再一次惊醒了朝野，向日本学习成了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基于上述历史背景，清朝政府着手开办培养日语翻译人才的教育机构，同时派遣留学生赴日留学。

自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第一批13名留学生起，公费派遣的留日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民间自费留学日本的学生也越来越多。特别是进入20世纪之后，赴日留学生的数量增加迅速，国内也出现了学习日语的热潮。

留学生以及国内学习日语人数的迅速增加，大大促进了日语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根据陈娟(2013)的统计，1900年至1908年间出版的面向中国人的日语教材多达100多种，特别是1905年、1906年、1907年出版的日语教材数量众多。20世纪前10年所出版的日语教材，种类繁多，其中包括词汇教材、会话教材、语法教材、读本教材等。其中出现了《东语正规》(1900)、《东文法程》(1905)、《东语简要》(1905)等在我国日语教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优秀教材。

但是，由于留学生数量的急剧增加，日本国内教育机构的接收能力受到极大挑战，进而出现了缩短教学年限、降低教学要求等现象，甚至出现了很多不具备相关资质的所谓学校，最终导致留日学生的质量不断下降。这一问题受到了清朝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批评和质疑。在质疑声中，清政府决定减少官派留学生的数量，这也影响到了民间留学日本的热情。从1908年开始，留学日本的学生数量不断减少。在此背景下，日语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以及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给许多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青年人带来了新的希望。此后，众多留日学生争相回国，导致在日留学生数量锐减。此后虽然留日学生的人数稍有回升，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步伐的不断加快，特别是1915年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以及一战中、一战后对我国领土的占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激起了国人强烈的反日情绪。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留日人数持续下滑，学习日语的热情不断降低。

1912—1922年间，日语教材的编写和出版总体处于低迷状态。本时期日语教材的出版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清末以来优秀日语教材的再版发行。如上所述，清末时期编写和发行了大量的日语教材，其中的一些教材质量较高，且符合中国人学习日语的实际需要，因此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多次再版，畅销不衰。这些教材包括《言文对照汉译日本文典》(松本龟次郎，1904)、《东文法程》(商务印书馆编译所，1905)、《改定日本语教科书》(松本龟次郎，1906)、《日语读本》(内堀维文，1909)、《日本文典》(芳贺矢一原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1907)等。



图1 部分清末代表性教科书封皮

另一部分是新编日语教材的出版。新编出版的日语教材包括中国人编写的日语教材和日本人编写的面向中国日语学习者的日语教材两大类。笔者利用日本国会图书馆、实藤文库、人民教育出版社图书馆百年教科书图片库中的所藏资料,整理出1912—1922年间新出版的日语教材10本(套),具体信息总结如表1。

表1 民国初期的日语教科书

| 序号 | 编著者 | 书名 | 出版者 | 出版时间 |
|----|----------------|-----------------|---------|------|
| 1 | 松本龟次郎 | 汉译日本语会话教科书 | 东京光荣馆书店 | 1914 |
| 2 | 松本龟次郎 | 汉译日本语会话教科书(增订版) | 有邻书屋 | 1915 |
| 3 | 奉天外国语学校 | 日本语读本(1~8卷) | 大阪屋号书店 | 1917 |
| 4 | 奉天外国语学校 | 速修日本语读本 | 大阪屋号书店 | 1917 |
| 5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教育研究所 | 日本口语法提要(全一册) | 大阪屋号书店 | 1919 |
| 6 | 葛祖兰 | 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 | 商务印书馆 | 1919 |
| 7 | 松本龟次郎 | 汉译日本口语文法教科书 | 笹川书店 | 1919 |
| 8 | 文化编译社 | 东文读本 | 文化编译社 | 1920 |
| 9 | 公民书局编译所 | 东文捷径 | 上海公民书局 | 1921 |
| 10 | 关东厅教科书编纂委员会 | 日本语读本(1~7卷) | 大阪屋号书店 | 1922 |

根据表1可知,(1)1912—1915年间出版的日语教材极少,仅有松本龟次郎的《汉译日本语会话教科书》《汉译日本语会话教科书(增订版)》。(2)在被日本占领的满铁附属地区以及“关东州”地区,日本殖民机构开始组织编写与学校课程相配套的日语教科书。同时还开始组织编写面向社会人员的日语速成教材。(3)中国人编写的日语教材稀少。上述10部教材中只有葛祖兰编写的《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和公民书局编译所编纂的《东文捷径》。

综上所述,民国初期的动荡社会局势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步伐的不断加快,严重影响了国人留学日本的意愿以及学习日语的热情,进而影响到了国内日语教材的编写与出版。总体来看,与清末以及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语教材编写高潮相比较,民国初期的日语教科书编写处于一个低迷甚至停滞的状态,可以说其是前后两

次日语教材编写高潮的过渡阶段。

3. 教材的总体特点

民国初期的日语教材出版虽然处于低迷期,但是其作为从清末到民国的一个过渡时期,期间编写出版的日语教材一方面延续了清末日语教材的某些特点,同时又体现出了一些新的编写倾向。

(1) 自学教材较多,学校教材较少

民国初期编写的日语教材中,供社会人员学习日语用的自学教材较多,专门面向学校教学而编写的日语教材稀少。主要原因是在民国初期新颁布的“壬子癸丑学制”中,外语以教授英语为原则,除少数特殊地区外,日语在学校教育中地位极低。这一时期出版的面向学校教育的日语教科书只有日本殖民统治机构组织编写的部分教材。当然,在个别地区、个别学校中也存在自学教材作为教科书使用的情况,但这种情况较少。

(2) 遵循传统的翻译法,带有汉语译文。但不再用汉字来给日语注音

清末及其之前的日语教材中,充分利用了母语汉语这一手段,包括用汉语发音给日语注音,用汉语进行解说,标注汉语译文等。民国初期的日语教材中保留了传统的用汉语进行解说的做法,并附有汉语译文。这一做法在之后的日语教材中一直得到了沿用。但是,清末教材中常见的用汉语给日语注音的做法被摒弃,在之后的日语教材中未再出现。

(3) 以培养学习者的语法能力、书面阅读能力为主

早期的外语教育多是以阅读书面材料为目的,因此书面阅读能力的培养成为最主要的目标。而语法知识的讲解、语法能力的培养被认为是培养阅读能力的基础,因而受到重视。民国初期的日语教材与清末的日语教材一样,同样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法能力,以提高学生的书面阅读能力。当然,期间也出现了口语教材,但是,一方面这些教材仍然以语法知识的讲解为主,另一方面这些教材多为日本出版,是为了满足在日本求学学生的生活学习需要。在与日本人直接交流的机会较为稀少的民国初期,会话能力的培养尚无迫切的社会需求。

(4) 课文中有关近代科学、政治、经济、地理知识的介绍较多,带有实用性色彩

清末民国初期正处于近代化的高潮之中,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制度、思想文化发展迅速。而中国却在近代化浪潮中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日本、欧美等国。因此,很多教材的编写者刻意在课文中介绍有关近代科学、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希望学生在学习日语的同时,能够接触新知识,了解外面的世界。这可以说是时代在日语教材中留下的烙印。

(5) 东北殖民地教材受到日本及中国台湾、朝鲜教科书的严重影响

日本帝国主义在相继占领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后,又取得了在我国南满地区的权益。其在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开展日语教育的过程中,开始阶段直接选用日本国内的小学国语教科书,后又根据当地实际,编写了相应的日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

包括《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1900年版)和《普通学校国语读本》(1911年版)等。东北殖民机构在编写日语教科书时大量引用了上述两种教科书以及日本文部省《寻常小学读本》(1910年、第二期国定)的内容,导致其无论在素材方面还是在编写理念(倡导直接教学法)方面都受到了日本、中国台湾及朝鲜日语教科书的严重影响。

4. 代表性教材介绍

4.1 《日本语读本》(1~8卷)

《日本语读本》的编纂者为奉天外国语学校^[3]。该套教科书于1917年出版发行,后经多次再版,迄今所知的版次有1920年第7版、1922年第9版、1924年第11版等。根据“绪言”所述,本套教科书的使用对象为“满铁”附属地区的公学堂(小学)一至四年级的学生。每学年2卷,上、下学期各一卷。

1905年,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得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及其附属权益,并于1906年11月26日在东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与“关东都督府”“驻东北总领事馆”共同构成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三大机构^[4]。1907年3月5日“满铁”总社迁至大连,积极开展对“满铁”附属地区的侵略和控制,教育侵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09年6月,“满铁”在盖平(今盖县)设立了第一所公学堂——盖平公学堂,标志着“满铁”在其附属地区开办学校教育的开始。由于“满铁”附属地区仍然执行清政府的《奏定学堂章程》,因此在学校建立之初,大部分科目仍然采用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中国发行机构发行的教科书。其中,日语科曾采用过日本文部省的《寻常小学读本》(1910年版、第二期国定)、《台湾教科用书

国民读本》(1900年版)。后来,伴随着当时社会情况的变化及“满铁”对“满铁”附属地教育认识的改变,“满铁”逐渐意识到自己编写日语教科书的必要性。1914年3月,“满铁”在其“地方课”中设置了“教科书编纂係”,开始编写日语教科书。1916年3月,附属地教育研究会编写的《公学堂日本语读本》(八卷)出版。此后,该套教科书的编写者和书名分别改为奉天外国语学校 and 《日本语读本》,由大阪屋号书店出版发行。^[5]

本套教科书共有八卷,笔者收集到了其中的第2卷(1920年第7版)、第5卷



图2 《日本语读本》卷二扉页

(1922年第9版)、第6卷(1922年第9版)、第7卷(1922年第9版)和第8卷(1924年第11版)。

每卷教科书都有“绪言”，主要介绍了该卷教科书的适用对象、所需课时、教学流程和教学方法，并对教科书生词的处理情况、练习题的使用方法以及卷末的附录部分进行了说明。

各课的主要内容 by 课文和练习两部分组成(参考图3)。课文均为书面文章，在每页的上部标出生词，并将新出现的汉字用“·”标注了出来。各课练习多为针对课文内容的提问或复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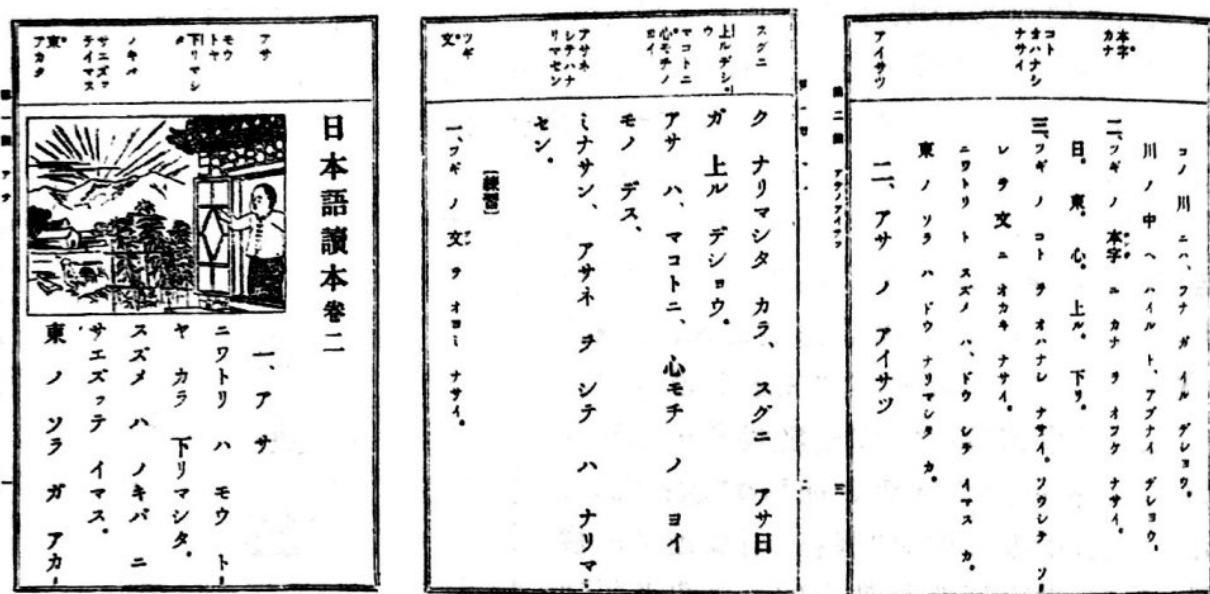


图3 卷二第一课

《日语读本》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编排课文内容，由少到多，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符合外语学习的认知规律。从收集到的教科书来看，课文的难度、篇幅以及从表记方法的选择等方面都体现出了循序渐进编排教学内容的理念。

本套教科书的课文中插入了大量的插图，这一特点在前几卷中体现尤为明显。第二卷的“绪言”中就明确指出“特意插入了大量的插图，以期使本教材成为一本直观的教材”(笔者译)。反映课文内容的插图，生动活泼，对小学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既有助于促进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但其中的部分插图以日本人为主人公，以日本人的生活情景作为代表性的生活情景，某些地方还出现了悬挂日本国旗的房屋(如图4)，无视我国的生活情形和风俗习惯，这肯定会影响我国学生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的形成，反映出教科书编写者利用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和同化教育的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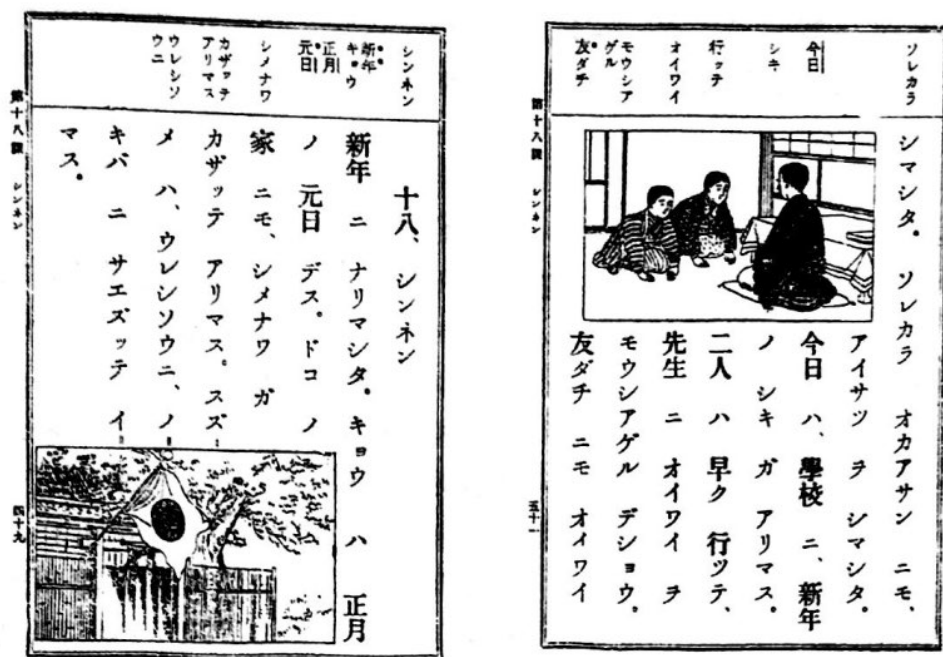


图 4 课文插图选

清末、民国的教材中,不设置课后练习题者居多。有些教科书中虽然设置了练习题,但题型单一,多为翻译句子、朗读生词等。本套教科书每课课文后都设置了课后练习,且题型丰富。题型包括基于课文内容的问答题、改错题、朗读单词或句子题、造句题、总结发表课文内容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帮助学生巩固语法、词汇,还可以确认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程度,提高学生的口头发言能力等较高层次日语运用能力。这一特点在同时代的日语教科书中是比较少见的。

本套教科书在“绪言”中指出,在授课时尽量利用实物、图画、动作等进行直观的教学,确实存在需要时可以使用汉语进行说明,但尽量不用汉语来翻译和解释,希望学生能主动学习,充分理解课文内容。这一表述明显是直接法教学的要求。据笔者分析,本套教科书采用直接法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方面,从1914年开始,“满铁”陆续邀请山口喜一郎、鹿子生三郎等来“满铁”附属地区召开日语教授法讲习所,主要讲授直接教学法。此后,“满铁”地区直接教学法取代传统的翻译教学法成为主流的教学法。^[6]另一方面,本套教科书选取自《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1900年版)和《普通学校国语读本》中的内容较多^[7],而中国台湾和朝鲜的日语教科书中均采用了直接法,这也直接影响了本套教科书中教学法的选择。

据竹中宪一(2002)统计,本套教材从日本文部省《寻常小学读本》(1910年、第二期国定)选用课文55篇,选用率为38.1%。从《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1900年版)选用课文38篇,选用率为26.3%。从《普通学校国语读本》(1911年版)选用课文128篇,选用率为88.9%。除课文内容外,大部分的插图也直接从原课文中选用。

本套教材为“满铁”组织编写。虽然编成后出于种种考虑,将编纂者更改成了奉天外国语学校^[8],但是在“满铁”的“推荐”下,在“满铁”附属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特别是在“关东厅”和“满铁”于1922年开始合作编写教科书之前)。该教科书采用直接法,反映了当时教学法的发展潮流,但是其大部分内容都选用自中国台湾、朝鲜以及日本

137

文部省编写的教科书,不能算是一本独立编写的、具有独立个性的教科书。其本质上是满铁为了控制满铁附属地区小学日语教学而组织编写的、日本帝国主义从教育上侵略中国的工具。

4.2 《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卷一、卷二合订本)

《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卷一、卷二合订本)由葛祖兰编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发行人张云五。该教科书初版于1919年2月,后多次再版,包括1931年6月增订第九版、1934年9月增订第十版、1935年5月增订第十二版等。



图5 《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封皮

根据该书“凡例”介绍,“自修适用”系列日语读本教科书共分为上、中、下三编,《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为其中的上编,专门详细注解日语中单词语法,内容范围广泛,适宜初学者自学使用。其中、下编专门详细注解句型以及篇章语法,名为《自修适用日文汉译读本》。

该书共有35课,其中卷一15课,卷二20课。除基本课文外,还包括序言、凡例、附表、附录、跋等内容。

本书卷一第一部分为序言,包括自序及他序。其中自序包括两篇:一篇为本教科书初次出版前作者于1918年12月所做的序言,主要介绍了本书编写的历史背景、基本内容构成等。根据该序言,当时作者正供职于澄衷中学校。另一篇为1922年1月所做的增订版序言,作者一一回应了该书出版以来

受到的三种评价,对于“头绪纷繁,不便初学”,作者表示虽头绪纷繁,在编写过程中已经尽量条理化;对于“定价太昂,不易购置”,作者表示物价飞涨,已经尽量选择最粗糙的纸张、最便宜的装订来降低定价;对于“砂中埋玉,米里藏珠,不愧为空前之佳作”的表扬,作者表示要继续努力提高修订版的质量。此外,还在修订序后列举了该次修订的要点。

他序为作者的同事、朋友为该书所做,包括葛遵礼、青木乔、赵时桐、李光业、钱通朋、钟寿昌等。

此外,卷二目录之前载有“绪言”。在其中,作者首先针对有读者批判该书读本与语法夹杂叙述的编排方式,指出在当时的日语教学中,读本与语法书分离,导致学生从不同课堂上学到的知识相互矛盾的现象,坚持认为自己的这种编排能够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学习。然后,针对有人批评该书未像其他教科书一样在日语上用汉字注音,作者主张注音会导致学习者的日语发音不准确,并提出了“耳多听”“口多诵”“目多看”“目口耳交相用”的日语学习方法。最后指出了学习日语时需要注意的五点,即注意读音、

注意字义、注意成分位置及省略、注意扩大所看日语书范围、注意日语口语表达的特点。

凡例主要介绍了本书编写的语言环境背景、整体的内容构成、各编的主要内容、译文翻译的标准及编写该书时参考的语法书、教科书等。本书上、下两卷分开编排目录,每课目录包含读本标题和该课中出现的语法项目两部分。

各课课文包括“原文”、“汉译”、“注解”、“备考”四部分。“原文”即通常所说的课文,均为作者从日本国语教科书及其他书籍中选取的短小文章或文章片段。文章中的汉字均用假名标有读音。“汉译”部分为“原文”的汉语译文。对于翻译的标准,作者在“凡例”中表示“原文可以意译者,务取意译,其不能意译者,则直译之,不失其原意为主”。“注解”为对原文中出现的语法现象或词语的解说。“备考”为对与该课相关的某一语法项目的详细分类总结。例如卷一第一课中的“备考”对日语中的人称代词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卷一、卷二均附有“附表”、“附录”。卷一的“附表”为“五类动词语尾变化行段检查表”,“附录”为“伊吕波歌(包括原文、释字、释句、汉译、空海和尚略传)”的介绍。卷二的“附录”包括(1)十品词之定义、(2)话之结构、(3)各种动词之辨别法、(4)汉音吴音唐音、(5)汉文日译之例、(6)批评。(1)至(5)为日语及相关知识的总结介绍,篇幅较长,共有44页,可称为一本微型语法书。(6)为当时教育界人士及社会名流对该书的表扬之信件的摘录。来信者包括新青年记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师钱玄同、吉林教育厅长杨莘耜、海宁许村场释放局长蓝欣禾、杭州中国银行行长蔡谷卿、绍兴第五中学校教务主任章鲁瞻、慈溪县公署教育科长姜可、奉天外国语学校教务长关根勤。

本书后有两篇跋,分别为蔡元培、朱宝莹所做。二人称赞《自修适用日语汉译读本》体力精当、注释详细明了,赞扬葛祖兰为中国日语教育所做的贡献。

本教科书中的课文(“原文”)部分大多选自《日本文部省寻常小学校读本》《高等国语读本育哑学校》等学校课本,其余少部分选自其他作品,均非作者独立编写。

本教科书中的语法解释非常详尽,远远超出一般教科书的注解范围,类似于专业语法书。正如作者在增订绪言中所述,本教科书中的语法解说方式受到当时很多日语学习者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批评,认为其过于繁杂,不便于初学者,但是作者却不以为然,坚持认为这种详尽的语法注解正是该书的特色之一。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述,当时的日语教材或为读本,或为语法书,有些读本中虽加入了语法解说,但是解说简略,内容局限。这种现象导致学习者通过读本所学与通过语法书所学知识不能一致,甚至不同课堂中所学存在矛盾之处。本书先给出读本,然后对读本中的语法进行详细注解,将二者融合在一起,避免了上述问题。

该书自出版以后,数次再版、修订,畅销全国,流行多年,为当时有志于学习日语的人士提供了优质的学习材料。该书作者留学日本多年,且在编写该书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语法书籍,保证了内容的准确性、科学性。同时,作者还针对当时日语的使用情况,兼顾了口语、文语以及口语文语混合体,保证了学习者所学到的日语能够在当时的生活中使用。此外,作者还抛弃了清末以来使用汉字给日语注音的做法,追求日语发

音的准确性,这体现出了作者对日语学习的一种新理解。总之,该教材特色鲜明,使用广泛,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是民国初期日语教科书中的佼佼者,在近代日语教材史上亦占有重要的地位。

4.3 《东文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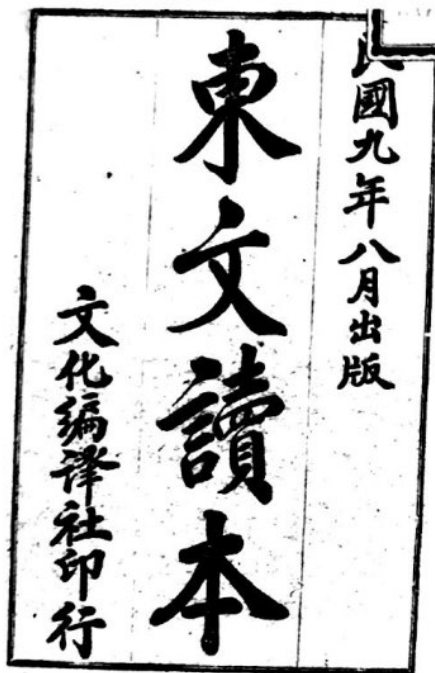


图6 《东文读本》封皮

小山左文二为日本明治时期宏文学院的教师,与松本龟次郎等一起教授留日中国学生日语,著有多部日语国语教科书、文典及供中国留学生使用的日语教科书。由他编写的《汉文注释东文读本》于1906年由日本三松堂书局出版发行。该教科书经中华民国文化编译社编译,于1920年(民国九年)8月出版发行。原书中附带有汉文注释,共186页。编译后,书中删除了汉文注释,共109页。

《东文读本》共由28课组成,分为前、后两编,每编各14课。每课的构造简单,仅有一篇文章,无语法讲解、单词讲解及课后练习。课文中的汉字都用片假名标注了读法。课文普遍较长。

本教科书中的课文多选自日本的国语教科书或某些文学家、科学家等的文章。虽然其中某些作品的出处不明,但是从这些课文的内容来看,很可能是编者从其他书籍中引用而来。

从课文的题材领域来看,本教科书选择了较多有关生物学、地理学、法律、教育以及工业发展等专业领域的文章,体现出编者有意识地介绍近代科学成果的倾向。此外,本套教科书中,选自中国古典的课文较多,包括前编“一 嘉言十则”、“一二 张良”,后编“八 前出师表”、“九 苏武”。

民国初期,日本国内出现了很多面向中国留学生编写的日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除了在日本得到广泛使用外,其中的许多还被中国的出版社或留日回国的学生编译后,在中国国内出版。《东文读本》即是其中之一。当时很多日语读本教材,均以初级日语学习者为使用对象,且语法的解说、单词的注释占了很大分量。该套《东文读本》以具备一定(或相当)日语能力的学习者为使用对象,且教科书全部由书面文章构成,体现出了自己的特色。

4.4 《日本语读本》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取代沙俄对旅顺、大连地区实施殖民统治后,仍然沿用沙俄对该地区的旧称“关东州”。1905年3月《大连公学堂暂行规则》的颁布标志着“关东州”日语教育的正式开始。该规则中,日语与读书、习字、算术一起被列入课程安排。“关东州”日语教育的初始阶段,选用《台湾教科用书国民读本》(1901年)为教科书,选用《国民读本参照国语课会话教材》(1900年)、《东语真传》和《东语初阶》为参考

本套教科书的课文中插入了大量的插图,这些插图反映课文内容,生动活泼,对小学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既有助于促进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当然由于该教科书从日本、中国台湾、朝鲜等教科书中选用的课文较多,其中的不少插图直接引用自所选用课文。



图9 第三学年用上卷第十课部分插图

第三学年用上卷中,每课课文之后配有相应的课后练习题,题型包括针对课文内容的问答、造句等。但是,第四学年用上卷、下卷中,取消了课后练习题。由于笔者收集到的教科书有限,未找到教师用书等相关的教材,无法得知教科书编写者的编排意图。

“关东厅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在编写本套《日本語读本》时,大量选用了当时已出版的日语教科书的内容。据竹中宪一(2002)统计,本套教科书从日本文部省《寻常小学国语读本》(1918年、第三期国定)选用课文13篇,选用率为22.8%。从“台湾总督府”的《公民学校用国民读本》(1912年版)选用课文28篇,选用率为49.9%。从“朝鲜总督府”的《普通学校国语读本》(1912年版)选用课文19篇,选用率为33.3%。从奉天外国语学校的《日本語读本》(1916年版)中选用课文21篇,选用率为36.8%。“关东厅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编写的该套教科书中的82.5%均为从其他教科书中选用的内容,仅有17.5%的内容为编者独立编纂的。除课文内容外,大部分的插图也是直接从原课文中选用的。

关于该套教科书从日本、中国台湾、朝鲜以及满洲日语教科书中大量选用内容的原因,竹中宪一(2002)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关东州”的很多官员曾在台湾供职,赞同在“关东州”地区实施与中国台湾同样的“同化主义”教育,因此支持“关东厅教科书编纂委员会”从中国台湾日语教科书中大量选用课文。另一方面也表明“关东厅教科书编纂委员会”在编写教材时,还受到了所谓的“内地延长主义”(即将“关东州”作为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对待,在其范围内实施与日本国内相同的教育政策)教育的影响。此外,由于该套教科书大量选用了日本、中国台湾、朝鲜以及当时南满洲的一些日语教科

书中的内容,因此其在教授法的选择(直接法)、课文内容的编排理念等方面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日语读本》虽名义上为“关东厅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编写,但是其中80%以上的内容均从日本、中国台湾、朝鲜以及奉天外国语学校《日语读本》中直接选用,编者独立编写的内容不到全部内容的20%。此外,该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也体现出“关东厅”要在所辖范围内实施“同化主义”、“内地延长主义”的意图。从根本上说,该套教科书是日本帝国主义推广日语教育,对我国东北地区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5. 结 语

本文通过对所收集到的民国初期出版发行日语教材进行分析,并结合清末以及民国中期日语教材的出版发行情况,指出民国初期我国日语教材编写低迷,新编日语教材数量较少。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清末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语教材编写高峰之间的过渡阶段。同时,通过对这一时期出版的各种日语教材的分析发现,这一时期的日语教材一方面继承清末日语教材的某些特点,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体现出了过渡性特点。“满铁”及“关东州”开始有意识地组织编写用于满铁附属地及“关东州”地区学校教育使用的日语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受到了中国台湾、朝鲜以及日本国内日语教材的全方位的影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文化侵略、教育侵略的工具,带有明显的侵略性质。此外,日本人(既包括友好人士,也包括日本侵略机构的工作人员)在这一时期的日语教材编写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人自主或独立编写的日语教材较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0&ZD095,首席专家:徐岩)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 [1]包括《日语读音》《日语文法》《日语动词使用法》《日语助动词使用法》《日语造句》《日语作文》《日语会话》《日语翻译》《日语尺牍》。
- [2]在课题研究进行过程中,根据民国时期学制的变化以及教材编写出版的具体情况,将民国时期分为了民国初期(1912—1922)、民国中期(1923—1937)、民国后期(1938—1949)三个时期。
- [3]1906年12月开设的民办汉语学校,原名为奉天外国语夜校。1910年与清语学堂合并,成立奉天外国语学校。接受满铁的资助,教授日本人汉语,教授中国人日语。
- [4]齐红深《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77页,2004年。
- [5]竹中宪一《满洲殖民地日本语教科书集成》(卷7),绿荫书房,2002年。
- [6]满铁初等教育研究会《满铁沿線に於ける日本語教授法の變遷》,1933年。
- [7]竹中宪一《满洲殖民地日本语教科书集成》(卷7),绿荫书房,2002年。
- [8]竹中宪一《满洲殖民地日本语教科书集成》(卷7),绿荫书房,2002年。
- [9]竹中宪一《满洲殖民地日本语教科书集成》(卷7)，“植民地に於ける日本語教科書”绿荫书房，2002年。

[10]竹中宪一《满洲殖民地日本語教科书集成》(卷7),绿荫书房,2002年。

参考文献

陈娟“试考清末的日语教材”,载《今日中国论坛》,2013年第8期。

李喜所“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载《文史哲》,1982年第3期。

李小兰“清季中国人编日语教科书之探析”,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7期。

李小兰、史占泓“清末日语教材的特点及其影响”,载《日本学论坛》,2004年第2期。

李小兰“试论清末东文学堂日语教科书”,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马可英“1937年前中国人编日语教材考略”,载《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齐红深著《日本侵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

田利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外语教育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鲜明著《清末中国人使用的日语教材》,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1月。

鲜明“《东语正规》在中国日语教育史上的意义”,载《日语学习与研究》,2011年第6期。

徐一平“中国的日语研究史初探”,载《日本学刊》,2002年第1期。

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译本),三联书店,1983年8月。

竹中宪一「满洲殖民地日本語教科书集成」(卷7)、緑荫書房、2002年9月。

作者简介

